

# “一带一路”倡议传播的四重逻辑

曹 勇, 张 然

(安徽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安徽 蚌埠 233030)

**摘 要:**“一带一路”倡议源于中国面向世界,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和人类对更加美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行动方案,具有重要的全球传播价值和意义。“一带一路”倡议传播的理论逻辑基于马克思主义全球化和世界历史理论,“一带一路”倡议传播的现实逻辑基于全球发展进程中面临着发展赤字、和平赤字和治理赤字等问题的挑战,“一带一路”倡议传播的历史逻辑基于中国历史中的优秀传统文化和古丝绸之路,“一带一路”倡议传播的斗争逻辑基于当前国际关系复杂性的理论斗争和实践斗争。

**关键词:**“一带一路”;传播;逻辑

**中图分类号:**D8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7-0358(2024)1-0015-05

## 0 引言

“一带一路”倡议自提出以来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以及沿线各国的大力支持。做好“一带一路”倡议的传播将有助于国际社会更好地理解“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要义与鲜明特征,进一步增强“一带一路”倡议对“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政府及普通民众的吸引力以及感召力,从而更好地助力全球治理体系的完善。

## 1 “一带一路”倡议传播的理论逻辑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共产党深刻思考人类前途命运所提出的中国方案,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新时代讲好“一带一路”倡议亟需阐释其传播的学理基础,唯有在理论上阐明“一带一路”倡议产生的历史必然性,才能使“一带一路”倡议在国际交流中减少阻力,形成共识。

### 1.1 基于世界历史理论的视角

习近平总书记从世界历史的视野出发,论述了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并从中国发展和世界发展相互离不开的视角思考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提出了“一带一路”伟大倡议。“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的那种地方的、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锁国状态被各民族、各方面的相互往来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都成了公共的财产。”<sup>[1]469</sup>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关于资产阶级对外掠夺的论述明显具有全球化发展的意蕴,他在分析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中指出,世界历史是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和相互矛盾运动而形成的客观自然历史过程。世界历史也体现为“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包括该阶段的整个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sup>[2]582</sup>。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不断地超出了国家和民族的范围,各个民族和国家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实践共同推动了世界历史的形成和发展。2022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过 121 万亿元,中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影响力不断提高,这些发展与变化有两个方面的意蕴:一是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的关联度和融合度越来越高,中国的发展为其他国家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二是中国的发展为世界的发展注入了活力,中国是世界经济的最大贡献者,中国是全球发展的重要推动者。换言之,“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并非偶然,它从世界历史的基本逻辑出发,深刻体现了世界各国只有互联互通才能实现共同繁

收稿日期:2023-02-16

基金项目:安徽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AHSKY2019D047)

作者简介:曹勇(1977—),男,安徽来安人,安徽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

荣和可持续发展。

## 1.2 基于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的视角

共同体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分析人类社会不同生活形态的崭新视角,强调了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在共同体实践中不断生成和发展的历史。马克思以生产关系为视角来考察共同体的历史演进,在生产力比较低的阶段,自然共同体是人类赖以生存的保障,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社会进入了以“物的依赖”为代表的虚幻共同体,而“自由人联合体”的真正共同体是对前两类共同体的超越,在真正共同体中,异化的人的依赖关系将彻底被扬弃,个体的真正独立性将回归。真正共同体的目的是解决社会不平等问题,以实现人类社会自由、平等和互惠互利的价值目标。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在当代的具体化运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指向是摆脱资本压迫和战争枷锁,强调国家利益和人类利益的共同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与真正共同体的价值要求具有一致性,内蕴着共生、共享、共荣的价值理念。“一带一路”倡议是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效路径。以共同体形态存在的“一带一路”倡议,既提供了各国所需要的自主性,也强调了各国交往中的共性问题,鼓励各国积极参与“一带一路”中的“硬联通”“软联通”建设,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的高质量建设,促进沿线各国的共同发展,推动沿线各国形成政治互信、文化包容、经济融合的共同体,为人类发展贡献出新的发展模式,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必将在世界发展史上成为增长之路和复苏之路。从某种程度上说,“一带一路”倡议开启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全球化发展的新时代,是一条通向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真正共同体的道路<sup>[3]</sup>。

## 2 “一带一路”倡议传播的现实逻辑

当前,人类社会的发展处于新的历史方位,既充满希望,又充满挑战。发展赤字、和平赤字和治理赤字是当前人类社会面对的重要挑战,这些挑战是人类共同的风险和共同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国际社会期待听到中国主张,中国不能缺席国际社会重大问题的解决。习近平总书记针对“三大赤字”问题提出了中国方案——“一带一路”倡议。这一倡议致力于合作共赢的理念,坚持各国共商共建共享,以开放包容的态度解决世界难题,是被实践证明能够有效解决全球治理“三大赤字”的中国方案。

### 2.1 “一带一路”倡议传播有助于发展赤字问题的解决

发展赤字源于世界经济的深度衰退、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和国际贸易萎缩等现实问题并存。发展不平衡是当今世界最大的不平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攫取了全球发展的主要成果,其他国家成为全球化时代风险的承担者,这种不均衡进一步将会影响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目的是沿线各国的共同发展,是各方面的共同发展。共同发展是解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所面临问题的重要手段。“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很大的市场潜力和很好的资源禀赋,无论石油还是各种矿物质都比较丰富,而我国这些资源相对短缺,因此,中国与沿线国家有着很强的经济互补性,通过有效开展基础设施方面的“硬联通”和政策对接方面的“软联通”,可以提高沿线国家之间贸易和投资合作的质量和效率,提高沿线国家的工业化和信息化水平。“一带一路”倡议的传播就要讲好中老铁路全线开通运营、中欧班列的年运输量不断攀升、中白工业园区平稳运行等发展的典型故事,把沿线各国人民对共同发展繁荣的梦想不断变成现实,帮助沿线各国分享中国发展红利。“一带一路”倡议已从理念转化为行动,共建“一带一路”已取得实质性进展,政府间签署的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逐年增加,设施联通促进了生产要素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有效配置,实现了共赢发展。“一带一路”倡议积极践行共商共建共享原则,通过畅通贸易释放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发展潜力,为治理发展赤字作出了中国贡献,推动了沿线国家经济的平稳发展。

### 2.2 “一带一路”倡议传播有助于和平赤字问题的解决

和平赤字源于国际安全环境的恶化。“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绝非偶然,具有其客观必然性,对于应对当今世界各类安全问题的挑战具有重大意义。“一带一路”沿线 65 个国家和地区有着各自复杂的历史和现实矛盾,涉及东亚、南亚、中亚、中东欧等不同的地区,利益关系错综复杂,面临着国际恐怖组织、宗教极端势力、有组织犯罪等众多风险与挑战。造成和平赤字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地区之间缺乏有效的和平合作,例如“一带一路”沿线中的伊朗和沙特两国之间没有形成有效合作,进而影响该地区的稳定发展。“一带一路”倡议致力于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长期性需求,致力于促进地区之间、国家之间的和平与稳定。在共建“一带一

路”过程中,中国打造结伴不结盟的伙伴关系,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谋求地区事务主导权,不断扩大“朋友圈”,推动沙特和伊朗于2023年4月6日宣布两国即日起恢复外交关系,为地区和平提供了中国智慧。

### 2.3 “一带一路”倡议传播有助于治理赤字问题的解决

治理赤字源于全球治理体系中原有体系功能的失灵和新体系还没有形成。原有全球治理体系主要是由西方发达国家制定,反映当时的国际关系实力,其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实现西方发达国家的利益,参与的代表性和利益的普惠性不足,已不适应时代进步和发展的需要。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是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失灵的表现之一,军备竞赛加剧是全球政治失序的表现之一,此外,随着能源资源枯竭和气候危机的不断加深,有些国际规则要么表现出滞后性,要么表现出混乱性,国际社会日益呈现出“去中心化”“分散化”特征。共商共建共享的治理理念是对治理规则中失序和失灵的修正,其创新性体现在全球治理的话语权由世界各国所共享,各种国际规则应由世界各国共同协商制定,在协商的过程中,每一个参与者都被允许平等地表达自己的需求,并对他国的方案提出质疑,进而推动各国对国际规则形成共识。“一带一路”倡议主张世界的事务由各国政府和人民协商解决,顺应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趋势,在全球治理理论和实践中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开始显现,成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新选择。

## 3 “一带一路”倡议传播的历史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了解历史、尊重历史才能更好把握当下”并“更好走向未来”<sup>[4]</sup>。“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具有丰富历史内涵的历史文化性概念,在沿用“丝绸之路”概念的基础上,赋予“丝绸之路”新的历史内涵,因此,“一带一路”倡议的传播要遵循历史逻辑。

### 3.1 “一带一路”倡议起源于古丝绸之路

第一,“一带一路”与古丝绸之路的概念具有同构性。“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一带一路”倡议的不同阶段的表述。自李希霍芬提出“丝绸之路”概念,“丝绸之路”这一表述在中西方的影响开始不断扩大。西汉时期,张骞从长安出发的和平使团开创了陆上丝绸外交之举;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在航海技术的加持下快速发展。此后,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同步推进,中外“丝路人”通过经济文化活动维系着丝路外交。明朝时期,郑和七次远洋航海又加速了丝绸外交,使“驼队和善意”“宝船和友谊”成为丝路外交的具象化表达,促进沿途各国互通有无、互学互鉴,结成“丝路经济共同体”。可见,丝绸之路的内涵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丰富,“一带一路”倡议正是对古丝绸之路丰富实践的凝练和抽象。

第二,“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内容是对古丝绸之路的传承与创新。“一带一路”倡议中的政策沟通、贸易畅通、民心相通等主张继承了丝绸之路的核心理念。丝绸之路促进了中西方贸易的繁荣,中国商人不断把瓷器、丝绸、漆器等独具中国特色的商品沿着丝绸之路运往不同国家和地区,同时,来自沿线国家的商人将亚麻、胡椒、葡萄和黄瓜等异质性商品通过丝绸之路也源源不断地运到中国。丝绸之路上商品的双向流通进一步带来了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交流、相互学习和相互融合,因而,丝绸之路也是文明交流之路。习近平总书记正是立足古丝绸之路的交往历史 and 世界形势的新发展提出了以“五通”为主要内容的“一带一路”倡议。

第三,“一带一路”倡议所蕴含的丝路精神体现了对古丝绸之路中经济和文化实践的创造性转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古丝绸之路绵亘万里,延续千年,积淀了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这是人类文明的宝贵遗产。”<sup>[5]</sup><sup>[193]</sup> 丝绸之路既是贸易之路,更是一条文化交流之路,例如,印度的佛教和艺术传入中国,并最终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以茶叶贸易为核心的万里茶道极大地促进了清代中国与沙俄之间的经济交往。丝绸之路虽然以丝绸命名,但是交易的商品种类繁多。“一带一路”倡导“计利当计天下利”的义利观,既是一种公平公正的义利观,也是一种互利共赢的发展观<sup>[6]</sup>。“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不是对古丝绸之路表述的简单的符号模仿,而是将丝绸之路的核心要素融入沿线国家及民众的历史记忆与文化情境中。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传播丝路精神,将丝路精神融入沿线国家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将唤起他们对丝路命运共同体的强烈认同。

### 3.2 “一带一路”倡议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第一,“一带一路”倡议是对和合共生的创新性发展。和合共生的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精髓所在,强调尊重包容世间万物的多样性以及差异性,强调不走极端,用平和平衡的方式来化解矛盾,



强调中庸之道<sup>[7]</sup>。“一带一路”倡议是对和合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强调以和为贵的协商理念。“一带一路”倡议强调沿线国家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超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对抗宿命论等错误思想,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强调在重大问题上各国共同参与,各国之间应相互尊重,反对干涉别国内政。习近平总书记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闭幕后会见记者时指出:“一带一路”建设“不以意识形态划线,不搞政治议程,不搞排他性安排”<sup>[8]</sup>。

第二,“一带一路”倡议是对义利合一的创新性发展。义利关系一直是中国古代学术研究的重点,很多思想家对此有精彩的论述。例如,孔子提出“义以生利,利以平民”,荀子提出“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墨家提出“义可以利人”,宋代王安石等人提出“义利双行,义利统一”。“一带一路”倡议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义利合一思想作为价值准绳,倡导“要坚持正确义利观,以义为先、义利兼顾,构建命运与共的全球伙伴关系”<sup>[9]</sup>,坚持合作共赢的理念,坚持将发展的最大公约数放在首位,秉持包容精神,反对歧视性竞争。“一带一路”倡议的原则是“共商、共建、共享”,虽然沿线国家有自己的发展路线图和自己的利益,但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宗旨是保障各自利益的同时实现共同利益,因此,这一倡议就更容易被沿线国家所认同和践行。

第三,“一带一路”倡议是对协和万邦的创造性转化。历代政治家在处理周边国家关系时一直推崇协和万邦和亲仁善邻的思想。《左传》记载:“亲仁善邻,国之宝也”<sup>[10]</sup>。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是在民族融合中不断发展的,因而,在国内和国外交往的过程中一直贯彻社会和谐和邦族和谐的理念,追求睦邻友好,在外交活动中积极践行亲、诚、惠、容的理念,守望相助。“一带一路”倡议对协和万邦理念进行创造性转化,坚持亲仁善邻,积极邀请周边国家共享中国发展的红利,破除“国强必霸”的迷思,愿意与沿线国家主动分享中国的发展经验,进而实现共同繁荣和共同发展,实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正向溢出效应。

#### 4 “一带一路”倡议传播的斗争逻辑

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国际政治传播的目的是增强交流互鉴,然而,由于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异质性,国际政治传播往往与意识形态斗争相互交织。“一带一路”倡议涉及众多国家与地区,利益关系错综复杂,因此,有针对性地开展基于“一带一路”倡议传播中的斗争,有助于排除传播过程中的干扰。

##### 4.1 “一带一路”倡议传播的理论斗争

冷战虽然已结束,但是冷战思维仍然不时泛起。冷战思维是影响当今世界和平和发展的最主要障碍,它从意识形态斗争和地缘政治的角度解读国际关系和国家政策。尽管大多数学者对“一带一路”倡议持肯定立场,但是仍然有一些西方学者和政客从冷战思维的立场对“一带一路”倡议进行歪曲和攻击,甚至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将破坏国际关系的稳定,带来修昔底德陷阱。2017年11月,美国总统前安全顾问班农在日本演说时指出,中国的发展正在挑战世界现有的秩序,特别是通过有计划地推进数字经济、“一带一路”、5G网络和人民币国际化四大经济战略来实现全球霸权,从而不断地扩大国际影响力,进而取代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建立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顾问班农言论的底层逻辑是绝对敌人理念的运用,是彻底的霸权思维。对于班农的言论,刘建飞教授认为班农的这套说辞充满了冷战思维,又极具蛊惑性<sup>[11]</sup>。为了打破冷战思维对“一带一路”倡议传播的挑战,中国需要加强对“冷战思维”进行批判性研究,修正西方国家对丝路学理论的阐释体系,构建符合国际传播的“一带一路”学术话语体系,进而从理论上阐明“一带一路”建设不会威胁任何国家,从舆论上消除“一带一路”倡议在沿线国家传播的思维障碍。

##### 4.2 “一带一路”倡议传播的实践斗争

“一带一路”沿线不同国家有着差异性的政治制度,既有与西方民主相似的资本主义国家,又有君主立宪制国家或政教合一国家,因而,“一带一路”倡议在传播过程中会面临不少风险和挑战。七国集团出于意识形态和利益考虑,提出了“重返更好世界”倡议,进而对抗“一带一路”倡议可能对欧洲带来的“隐形入侵”。有些政客和学者把“一带一路”倡议解读为恢复朝贡体制,有些欧美及日本学者将“一带一路”倡议界定为新马歇尔计划,这些是完全错误的观点,没有看到两者在根本目的和设计构想上的完全不同。马歇尔计划是有政治目的的,“一带一路”倡议强调尊重不同国家的道路选择,不干涉他国内政,推动中国与沿线国家共同发展,进而拉动世界经济的整体性增长。有些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进行选择接受,接受“一带一路”建设中的经济利益,抵制“一带一路”倡议中的政治价值立场。一些西方国家担忧“中国模式”一旦成为被广泛认可

的世界标准,将挤掉西方过去享有的优先权和话语权,故而从舆论上对“中国模式”大肆攻击、恶意诋毁<sup>[12]</sup>。“一带一路”倡议在加速推进传播进程的新阶段,仍然面临着西方少数国家的抵制和沿线国家的模糊态度,遇到新的困难、挑战与风险,对此,我们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应对和化解这些问题,这也是“一带一路”倡议及其传播的重大使命。

## 5 结束语

“一带一路”倡议为世界发展提供了一个包容性平台。从现实来看,理论逻辑研究有助于讲深“一带一路”倡议,现实逻辑研究有助于讲活“一带一路”倡议,历史逻辑研究有助于讲透“一带一路”倡议,斗争逻辑研究有助于讲实“一带一路”倡议,应通过四重逻辑叠加,不断提升“一带一路”倡议传播的立体性和叠加性效果与质量,不断扩展“一带一路”倡议世界影响力。

## 参考文献:

- [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 [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3]郑云天.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际大局观[J].理论与改革,2018(6):86-94.
- [4]习近平.携手共创丝绸之路新辉煌——在乌兹别克斯坦最高会议立法院的演讲[EB/OL].(2016-06-23)[2023-01-02].<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6-06/23/c-11190949-00.html>.
- [5]习近平.习近平谈“一带一路”[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
- [6]王志民.传承丝路精神,描绘宏伟蓝图[J].人民论坛,2017(14):46-47.
- [7]王程,周丽.“一带一路”的经济哲学追问[J].现代经济探讨,2015(10):30-34.
- [8]习近平会见中外记者介绍“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主要成果的报道[EB/OL].(2017-05-16)[2023-01-18].[http://china.cnr.cn/news/20170516/t20170516\\_523756217.shtml](http://china.cnr.cn/news/20170516/t20170516_523756217.shtml).
- [9]习近平.为建设更加美好的地球家园贡献智慧和力量[N].人民日报,2019-03-27(3).
- [10]石书臣,张金福.中华“和合”文化的当代阐发与实践[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9(4):46-54.
- [11]刘建飞.理性应对班农式冷战思维[N].学习时报,2018-01-15(2).
- [12]曾荣.“一带一路”背景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外传播的创新路径[J].深圳社会科学,2019(6):5-12.

(责任编辑:范可旭)

# The Four-fold Logic of the Dissemina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AO Yong, LIU Huan

(School of Marxism, 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ngbu 233030, China)

**Abstract:**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hich originated in China and is oriented to the world, provides a program of ac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he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system and mankind’s exploration of a better social system, and has important global dissemination value and significance. The theoretical logic of the dissemina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based on the Marxist theory of globalization and the theory of world history, and the practical logic of the dissemina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based on the challenges of the global development process, which is faced with the problems of development deficit, peace deficit and governance deficit. The historical logic of the dissemina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based on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of Chinese history and the ancient Silk Road, and the logic of the struggle for the dissemina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truggle over the complexity of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Key words:** “Belt and Road”; dissemination; logic